

明代徐爌《文心雕龙》跋语“王孙孝穆”考

——兼论《文心雕龙·隐秀》补文证伪的一条新线索

朱供罗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明代学者徐爌在《文心雕龙》跋语中指出,《隐秀》补文由“王孙孝穆”从“故家旧本(宋本)”中钞录。前辈学者对于“王孙孝穆”的身份皆有误解。据朱谋㙔《续书史会要》,“王孙孝穆”即朱谋㙔第三子朱统𤟿。朱统𤟿所见“故家旧本”必为其父所见,但朱谋㙔跋语从未提及“故家旧本”;另一方面,徐爌也从未对朱谋㙔从许子洽处转钞钱功甫《隐秀》再写寄梅子庾补刊有所提及。朱跋与徐跋彼此矛盾,为《隐秀》补文的证伪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 文心雕龙;《隐秀》补文;明代;徐爌;跋语;王孙孝穆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2-0070-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2.011

The Research on Royal Xiaomu in the Postscript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y the Scholar Xubo in the Ming Dynasty

——A New Clue to the Falsification of the Complement in *Yinxu*

ZHU Gongluo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Xubo, a scholar in the Ming Dynasty, noted the completed words in *Yinxu* was transcriptional from the version in the Song Dynasty by Royal Xiaomu. The former scholars misunderstood the identity of “Royal Xiaomu”. According to *A Continual History of Calligraphy* by Zhu Mouyin, “Royal Xiaomu” is the third son of Zhu Mouhan, that is, Zhu Tonghuang. The old version should be known by Zhu Mouhan, but he did not mention a word about 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Xubo also did not have words about the transcription by Zhu Mouhan from *Yinxu* by Qian Gongpu. The mutual contradictions are found in the postscripts by Zhu and Xu, which provide the new clue for the falsification of the complement in *Yinxu*.

Key word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the completed words of *Yinxu*; the Ming Dynasty; Xubo; postscript; Royal Xiaomu

徐爌,“初字惟起^①,更字兴公,闽县人,有《鳌峰集》。”^[1]《明史·文苑传·郑善夫传》附载徐爌事迹:“爌以布衣终。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鳌峰书舍至数万卷。”^[2]⁷³⁵⁷据《列朝诗集小传》,“兴公博学工文,善草隶书,万历间与曹能

始猗,主闽中词盟,后进皆称兴公诗派。嗜古学,家多藏书,著《笔精》《榕阴新检》等书,以博洽称于时。”^[3]徐爌与其兄徐燧建有多处藏书楼^②,其中南损斋有题跋云:“兴公聚书至数万卷,所居鳌峰麓。客从竹间入,环堵萧然,而牙签四围,缥緜

收稿日期:2019-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16XZW001)。

作者简介:朱供罗(1978—),男,湖南双峰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论、写作的教学与研究。

①杨明照认为,徐爌原名“惟起”,似误。“惟起”不是徐爌原名,是徐爌起初的字,后来又改字“兴公”。

②徐爌与兄徐燧建有绿玉斋、红雨楼、宛羽楼、南损斋等。

之富，卿侯不能敌也。其考据精核。”^[4]

曹能始即曹学佺，曾为闵绳初刻杨慎批点本《文心雕龙》（此即明凌云套印本^①）作序，并作评点57则。^[5]徐勣与曹学佺交厚，也曾批校《文心雕龙》。徐勣批校本《文心雕龙》，以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一元私淑轩原刻为底本，参以朱谋玮、谢兆申二家校注。此校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成今世罕见之本”“历三百年而岿然无恙，尤足珍视”。^{[6]782}此校本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年代久远保存完好，还在于保留了不少前人（如程宽、叶联芳、乐应奎、载玺、伍让等）的序言，更重要的是此校本交代了《隐秀》篇补文的一个重要来源——王孙孝穆所见“故家旧本”（宋本）。那么这个“王孙孝穆”到底是何人呢？

一、“王孙郁仪”“王孙图南”之渊源

《文心雕龙》徐勣跋语，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搜罗钞录，共有8则，其中7则录自徐勣批校本《文心雕龙》第三册卷末附页，1则录自《重编红雨楼题跋》卷一。这些跋语中，有两次提到“王孙孝穆”。要了解“王孙孝穆”，首先要了解“王孙郁仪”与“王孙图南”。

徐勣跋语其三曰：

《文心雕龙》一书，余尝校之至再至三，其伪误犹未尽释然。彦和博综群书，未敢遽指为亥豕而臆肆雌黄也。今岁偶游豫章，王孙郁仪素以洽闻称，余乃扣之。郁仪出校本相示，旁引经史，以订其讹，详味细观，大发吾覆。郁仪仅有一本，乞之不敢，钞之不遑；而王孙图南欣然捐家藏斯本见赠。余方有应酬登眺之妨，郁仪又请去重校，凡有见解，一一为余细书之；灯烛下作蝇头小楷，六十老翁用心亦勤，爱我亦至矣。今之人略有一得，则视为奇秘，不肯公诸人；偶有藏书，便秘为帐中之宝。若郁仪、图南，真以文字公诸人者也。郁

仪名谋玮，石城王裔；图南名谋璿，弋阳王裔，皆镇国中尉，与余莫逆。时万历己酉十一月二十八日，徐惟起书于临川舟次。^{[6]748}

万历己酉年（1609年），徐勣游豫章（治南昌县），朱谋璿出校本相示，徐勣大受启发。“郁仪仅有一本，乞之不敢，钞之不遑。”为难之际，与朱谋玮同为江西王孙、同是镇国中尉的朱谋璿欣然将家藏《文心雕龙》捐赠给徐勣。朱谋玮又将校注一一细书于此本之上，“灯烛下作蝇头小楷”。徐深受感动，“六十老翁用心亦勤，爱我亦至矣”，大发感慨，“郁仪、图南，真以文字公诸人者也。”

郁仪是朱谋玮的字（一字明父），图南是朱谋璿的字，两人都是宁献王朱权七世孙，朱权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所以两人是真正的王孙。朱谋玮的世系如下：权—盘斌—奠堵—覲镐—宸湏—拱概—多勣—谋玮，^{[2]3591-3597}其中奠堵是惠王盘斌第四子，封为石城王，所以朱谋玮是石城王裔。

《明史》卷一百十七记载了朱谋玮的情况：

三世（注：指拱概、多勣、谋玮）皆端谨自好，而谋玮尤贯串群集，通晓朝廷典故。诸王子孙好学敦行，自周藩中尉睦㮮^②而外，莫及谋玮者。万历二十二年，廷议增设石城、宜春管理，命谋玮以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得劾治不法者。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约束。暇则闭户读书，著《易象通》《诗故》《春秋戴记》《鲁论笺》及他书，凡百十有二种，皆手自缮写。……病革，犹与诸子说《易》。子八人皆贤而好学。^{[2]3597}

由《明史》可知，朱谋玮博学多闻，治理有方，勤于著述，在病急之时犹与诸子说《周易》。他的八个儿子“皆贤而好学”，正是家风熏浸的结果。此外，朱谋玮钻研《文心雕龙》五十多年，卓有成效，详见后文。

朱谋璿的祖上世系并不很清楚，只知道他是弋阳王奠璿后裔，奠璿是宁王权之孙，是惠王盘斌第五子，也是石城王奠堵之弟。“弋阳五传而绝^③，

①杨明照认为：此本有梅庆生注，盖刻于万历四十年之后天启二年前，非以梅氏万历三十七年所刻者为底本，出于梅氏所重校改刻者。

②朱睦㮮（1518年~1587年）字灌甫，号西亭。明太祖六世孙，封镇国中尉。明代儒学家。万历年间举周藩宗正。勤思好学，把当时藏书最富的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之书购置于“万卷堂”中诵读，时人比之为汉代的刘向。

③其世系为：奠璿—覲镐（《弇山堂别集》作“覲鏐”）—宸湏—拱概—多勣。参看《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

宗人举多煌贤能，敕摄瑞昌府事，诸宗皆属焉。”^{[2]3598}多煌之弟多烜，正是朱谋㙔的父亲。

《明史》卷一百十七记载了朱多烜、朱谋㙔父子的情况：

多烜者，亦奉国将军，颖敏善诗歌，尝变姓名出游，踪迹遍吴楚。晚病羸，犹不废吟诵。卒，门人私谥曰“清敏先生”。子谋㙔，亦有父风。时乐安辅国将军多燮有诗癖，与谋㙔等放志文酒，终其世。^{[2]3598}

《江西通志》对于朱多烜父子的记载更为详细：

朱多烜，字贞吉，弋阳王多煌之弟。颖敏绝人，善诗歌，兼工绘事，……尝轻装出游，变姓名为来相如。远游山水，踪迹遍吴楚之间。……以《倦游》名其诗。”^[7]

朱谋㙔，字子鱼。他也像其父一样乐游山水，爱好吟咏，也曾改换姓名出游，他变名为“来鯨（一说来鲸）”。朱谋㙔还是八大山人朱耷的伯父，他与汤显祖交往密切，其诗集曾得临川汤显祖作序，^[8]可惜此序已不存。

二、“王孙孝穆”的来源及前人之误解

朱谋㙔捐赠、朱谋埜标注《文心雕龙》九年之后，万历戊午年（1618年），徐爌再次客游南昌，这次他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王孙孝穆已从故家宋本补全《隐秀》篇缺文。徐爌跋语记录“王孙孝穆”有两处，其一曰：

第四十《隐秀》一篇，原脱一板。予以万历戊午之冬，客游南昌，王孙孝穆云：“曾见宋本，业已钞补。”予亟从孝穆录之。予家有元本，亦系脱漏，则此篇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因而告诸同志，传钞以成完书。古人云：“书贵旧本。”诚然哉！己未秋日，兴公又记。^{[6]749}

其二曰：

《隐秀》一篇，诸本俱脱，无从觅补。万历戊午之冬，客游豫章，王孙朱孝穆得故家旧本，因录之。亦一快心也。^{[6]750}

王孙孝穆告知“曾见宋本”，并已钞补《隐秀》篇缺文。徐爌连忙请求从朱孝穆处钞录《隐秀》补文。徐爌对朱孝穆找到宋本并钞录《隐秀》

高度评价，“此篇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徐爌钞录补文后，想着“书贵旧本”，又与友人分享，“告诸同志，传钞以成完书”。关于此次传钞告之的“同志”，其中应该有曹学佺。因为，十年前曹学佺即已向徐爌修书一封，请求录《隐秀》《原道》见示。

文心雕龙校过数本，但首篇有“莫不原道心裁文章”之句，恐脱。及第四十隐秀篇，自“互体变爻而成化”起，至“珠玉潜水”止，俱亡。想兄所校者已精，幸录此二篇见示，则为完书矣。戊申八月，弟佺顿首。^{[6]751}

万历戊申年（1608年）曹学佺请求见示，没想到，十年后的万历戊午年（1618年），徐爌才从朱孝穆处钞录《隐秀》篇全文。书得旧本，自然“快心”，传钞曹学佺，以成其十年前的“完书”之请，应在情理之中。

徐爌又在《隐秀》篇末交代补文来源——“王孙朱孝穆得故家旧本，因录之”，并再次表明喜悦之情，“亦一快心也。”

那么，这两处提到的“王孙（朱）孝穆”到底是谁？龙学界目前的几种说法似乎都有误。

一种是将“王孙孝穆”看作是“朱谋埜”。这种说法并不是杨明照直接主张，而是从他的有关论述中推论出来的。杨明照在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对《文心雕龙》版本有过简述，“其未得见者，仍胪列于次”，其中就有“明朱谋埜所见宋本”，并提示“见徐爌跋”^{[6]789}。然而，根据徐爌跋语，“曾见宋本”的只有“王孙孝穆”，所以说，杨明照是将“王孙孝穆”看作是“朱谋埜”了。

一种是将“王孙孝穆”理解成“朱谋埜”。1980年，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对上引徐爌跋二有案语：

案万历己酉（一六零九）梅庆生刻本引朱谋埜尚云：“《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可复考。”朱氏万历癸巳（一五九三）序亦称“《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复可补。”盖相去十余年，朱氏得故家旧本补入，徐氏更从而逐录之也。^[9]

显然，王利器是将“王孙朱孝穆得故家旧本”中的“朱孝穆”看作是“朱氏”，并把“朱孝穆”等

同于“朱谋玮”了。1982年，詹鍈在《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中说，“朱谋玮曾‘得故家旧本’，徐勣是从他那里录去的”^[10]，可见，詹鍈也是把朱孝穆直接理解成朱谋玮了。如此理解的还有多人。1993年，祖保泉在《文心雕龙解说》中谈论《隐秀》补文之伪时，曾对“原脱一版”有过精妙的批驳^{[11]785-786①}，但他把“王孙孝穆”直接括号加注为“朱谋玮”了^{[11]785}。此外，2004年版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谈到《隐秀》篇补文的真伪时，把“王孙孝穆”注为“（即朱谋玮，字孝穆）”（此观点似出汪春泓）^[12]。

还有一种理解，把“朱孝穆”理解成与“朱谋玮”完全无关的人。周振甫即为此例。他一方面认为：阮华山本宋本转到钱功甫再转到钱谦益手里，钱谦益的书被烧就失传了；许子洽钞钱功甫宋刻朱郁仪再转钞的版本也是阮华山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三个宋本，“宋本有阮华山藏本、朱孝穆所见本、胡震亨子胡夏客家藏本，都不传。”^[13]显然，周振甫认为，朱郁仪（即朱谋玮）是一个人，朱孝穆是另一个人，两者分别和一个宋本有关，彼此没有联系。

笔者认为，无论是将“王孙孝穆”理解成“朱谋璿”或是“朱谋玮”，都有误。最明显的理由是：朱谋玮的字是“郁仪”或者“明父”，朱谋璿的字是“图南”，两人的字都不是“孝穆”。那么，杨明照、王利器、詹鍈、祖保泉、汪春泓这样的龙学名家，为什么会把“王孙孝穆”误认为是“朱谋玮”或“朱谋璿”呢？笔者猜测，可能是跋语中徐勣第一次游豫章（南昌）时提到了自己与“朱谋玮”“朱谋璿”两位“王孙”的莫逆之交以及两人对自己的无私帮助，所以第二次再游南昌拜访“王孙孝穆”，杨明照、王利器、詹鍈、祖保泉、汪春泓等著名学者也就没有细究，简单地将“王孙孝穆”认定为是第一次游南昌时两位“王孙”中的一位，不是“朱谋玮”，就是“朱谋璿”了。只是这点偶然疏忽，却造成了对于“王孙孝穆”身份的错误认定，而且由于杨、王、詹、祖、汪、周等人的专著与论文的广泛影响，这一错误认

识广泛存在而不为人知。

至于将“王孙（朱）孝穆”与朱谋玮看作完全无关的两个人，也是不对的。那么，“王孙孝穆”到底是谁？他和朱谋玮有什么关系吗？

三、“王孙孝穆”的真实身份

笔者根据明代朱谋璿所撰《续书史会要》的一段话，首次发现了“朱孝穆”的真实身份：

石城王孙谋玮，字郁仪，博雅好古，著述百有余种，总名《天宝藏书》。尤研精于六义，所著有《六书贯玉》《六书本原》《六书绪论》《古文奇字辑解》《字原表微》《说文质疑》等书。又考订《大禹碑》《周宣石鼓》《比干墓铭》，手自摹临而诠释之，曰《三古文释》。其第三子统镠，字孝穆，博雅能如其父，喜书法，而津津然以悬腕中锋为贵，于诸帖能淹贯，故作字必有所本，盖以学胜者。持斋三十余年，手书《华严经》，不尽七卷而没。玮封镇尉，万历朝奉敕理藩政。镠封辅尉。^[14]

原来，朱统镠字“孝穆”，是朱谋玮第三子，封辅国中尉。喜爱书法，如同他父亲一样博雅多学。联系《明史》朱谋玮“子八人皆贤而好学”的记载，“博雅如其父”可以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朱统镠情况的朱谋璿及其《续书史会要》。朱谋璿，字隐之，号八桂，又号仄原山人，乐安靖庄王朱宸湍后裔，多燬子，封奉国将军。“特擅临池，鸾鹄虎跃，标帜一家，屏幛榜额，得手笔为重。又喜陶氏《书史会要》有益书家，乃摭有明一代续其卷后。”^[15]朱谋璿书法出众，“标识一家”，受人追捧；又认为陶宗仪《书史会要》搜集上古至元代书法大家，简要评述并总述书理，有益书林，于是补足明代书家，著《续书史会要》。朱谋玮与朱谋璿是同宗兄弟，朱统镠是朱谋璿同族侄子，三人的封地（南昌与乐安）也相距不远，并且都擅长书法爱好诗词，所以朱谋璿对朱谋玮父子应该非常了解，他在《续书史会要》记载的有关朱谋玮父子的情况应属可信。

①祖保泉认为：一版分两半，总字数不可能是现在补文的单数（411）；又缺文前残留文字128字，应该以每行16字排版，如此则一版只可能是24行，共384字，尚余27字不在“一版”之内。

四、“朱孝穆（统镠）”身份带来的徐跋朱跋质疑

朱孝穆（统镠）即朱谋玮之子，此身份又带来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与朱谋玮、徐燊所作跋语有关。

朱谋玮跋首见于明梅庆生万历音注本《文心雕龙》卷末，此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于南京。徐燊称之为“金陵善本”。卷末跋语曰：

往余弱冠，日手抄《雕龙》讽味，不舍昼夜。恒苦旧无善本，传写讹漏，遂注意校雠。往来三十余年，参考《御览》《玉海》等籍，并据目力所及，补完改正，共三百二十余字。如《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可复补；他处尚有讹误，所见吴、歙、浙本，大略皆然。虽有数处改补，未若余此本之最善矣。俟再谘访博雅君子，增益所未备者而梓传之，亦刘氏之忠臣，艺苑之功臣哉！万历癸巳六月日，南州朱谋玮跋。^{[6]746}

在此本《隐秀》篇末，朱谋玮也有跋语：“《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可复考。”^{[6]746}

梅庆生天启二年（1622年）校定重修《文心雕龙》，将《隐秀》篇补文首次刊刻。朱谋玮在此《隐秀》篇末再次作跋，交代缘起：

《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庾既以注而梓之。万历乙卯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来过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写寄子庾补梓焉。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尚缺十三字，世必再有别本可续补者。^{[6]746}

从以上跋语可知，万历癸巳年（1593年），朱谋玮即已钻研《文心雕龙》“三十余年”，并据目力所及先后补正320余字，朱谋玮对《文心雕龙》可谓用力既久且勤，收获颇丰。但对于《隐秀》缺文，朱谋玮感叹“旁求不得”“不可复补”。万历乙卯年（1615年），好友许子洽从钱功甫（即钱允治）万卷楼检得宋代刻本，钞补《隐秀》，朱谋玮因而钞录以成完璧，并写寄梅子庾刊刻。此时，朱谋玮已经钻研《文心雕龙》五十多年了。

对照徐燊与朱谋玮两人跋语，我们不禁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

1. 朱孝穆所见之“故家旧本”是否就是朱谋

玮从许子洽处转钞所据的“钱功甫万卷楼宋刻”？

应该不是。据《绣谷亭书目题解》，“钱功甫有阮华山宋刊本，秘不肯示人，所以传于世者极少也。”^{[6]756}所以，朱孝穆所见宋本不是钱功甫所见宋刻，而是另外一本。正如傅增湘所说，“所见在钱功甫之外矣”^{[6]750}。

2. “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大功”何以归于孝穆？

徐燊宣称万历戊午年（1618年）冬从朱孝穆处钞补《隐秀》，感慨“此篇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这一“大功”何以归于朱孝穆呢？从时间上讲，朱孝穆并不是第一个钞录《隐秀》补文的。钱功甫自言“余从阮华山得宋本钞补，始为完书”^{[6]751}，这是第一次钞录《隐秀》补文，时间在万历甲寅年（1614年）。此后万历乙卯年（1615年），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捡得宋刻，钞录《隐秀》补文并由朱谋玮转钞，想来朱孝穆也见过此转钞之《隐秀》补文。此后万历戊午年（1618年），朱孝穆告知徐燊“曾见宋本，业已钞补”。可以推论，朱孝穆应不是转钞，应该是真的发现了宋本并钞补《隐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此篇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孝穆之功大矣”。

3. 既然朱孝穆得“故家旧本”之宋本而钞补《隐秀》，那么作为朱孝穆的父亲，对《文心雕龙》下了五十多年功夫的朱谋玮怎么可能没看过“故家旧本”之宋本？如果看过，为何在朱所作跋语中一字不提呢？

朱谋玮在万历乙卯年（1615年）转钞许子洽《隐秀》补文，才“遂成完璧”。3年后的万历戊午年（1618年）冬天，徐燊客游南昌，王孙朱孝穆“得故家旧本”“业已钞补”。那么，朱孝穆应该是在万历乙卯至万历戊午之间的三年时间里看到“故家旧本”的。此“故家旧本”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世宦大家之旧本”，另一种情况是“自家原有之旧本”。如果是“自家原有之旧本”，朱孝穆能看到，朱谋玮更应该早就看到。但朱谋玮从未提及自家原有宋本，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是朱孝穆从别的世宦大家得来的旧本，作为儿子，他也应该会让父亲分享。因为，朱谋玮对《文心雕龙》倾注五十多年的心血，一直在找寻《隐秀》缺文！朱孝穆（朱统镠）应该有帮父亲达

成心愿的孝心。但朱谋玮竟没有对“故家旧本”这一重要版本有补充说明，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梅庆生（字子庾）六次校定重修《文心雕龙》^①，也只是在跋语中交代了万历乙卯年（1615年）许子洽钞录钱功甫宋刻的往事，而没有对其子（或者自己）“曾见宋本，业已钞补”有片言提及。难道他竟没有看过“故家旧本”吗？如果他看过，不可能不对此进行说明。

有没有可能朱孝穆见到“故家旧本”的时候，朱谋玮已经过世了呢？如果这样，朱谋玮没有写作新的跋语，没有交代《隐秀》补文的新出处，这就说得通了。但是，这是不成立的。据林仲湘《疑年录补六十例》考证，朱谋玮卒于天启四年（1624年）。关键证据是郑仲夔《耳新》卷五《同声》云：“（余）以乙卯秋，友郁仪王孙谋，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郁仪卒。”^[16]可见，郑仲夔与朱谋玮交友始于万历乙卯年（1615年），约十年后，朱谋玮卒于甲子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梅六次校定重修本《文心雕龙》首次刊出《隐秀》补文的时候，朱谋玮还在世，但他的跋语却没有关于其子（或是自己）见到“故家宋本”的任何说明。

4. 可不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朱孝穆其实没有得到“故家旧本”，也没有看过真正的“宋本”，他只看过朱谋玮从许子洽处转钞钱功甫宋刻的《隐秀》补文，却托大说是“曾见宋本，业已钞补”，而徐爌误信之，认为朱孝穆得“故家旧本”钞录，并因此将“文字既绝而复搜得”之大功归于孝穆。

这种设想有一定的合理性。朱谋玮研究《文心雕龙》五十多年，也没有说亲眼看到“宋本”，而据朱孝穆“曾见宋本，业已钞补”推断，在万历乙卯年（1615年）至万历戊午年（1618年）之间的三年间却突然出现了“故家旧本”，其来源也没有交代清楚，着实可疑。但朱孝穆“托大”之说也将面临以下三点困惑：首先，朱孝穆的学术诚信乃至人品就让人怀疑了。其次，徐爌既然说

“王孙朱孝穆得故家旧本”，应有所本而不是乱说。再次，徐爌研究《文心雕龙》将近四十年^②，又曾将补文“传钞诸同志”，不应该不慎重而出现误信托大之辞的事情。

五、跋语歧互可证《隐秀》补文之伪

詹锳曾说：“如果硬说（《隐秀》）补文是伪造的，那么朱谋玮这段跋语也必然是伪造的。为什么这段跋语交代补文的来源这么清楚，而且人证物证俱在。何况朱谋玮是朱明王朝的宗室，这样高贵的王孙，有谁敢伪造他的跋语呢？”^[17]一般情理上推断，的确没有人敢伪造朱谋玮的跋语。但如果徐爌宣称的朱孝穆“曾见宋本（故家旧本）”是真，则朱孝穆的父亲朱谋玮肯定看过宋本，那么他写的跋语就不应该对此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徐爌和朱谋玮是“莫逆”之交，他与朱孝穆也交情很深。那他对于朱谋玮万历乙卯年（1615年）曾从许子洽处转钞钱功甫宋刻本《隐秀》补文，应该是了解的，至少朱孝穆（朱统镠）应该知晓此事，很可能在万历戊午年（1618年）告诉徐爌，但他在跋语中对此也不置一词，却两次交代对万历戊午年（1618年）冬天从朱孝穆处转钞《隐秀》补文，这也颇难理解，毕竟父亲朱谋玮研究《文心雕龙》时间很长、发现《隐秀》补文更早！所以，从徐跋中朱孝穆“曾见宋本（故家旧本）”以及徐爌不提朱谋玮转钞《隐秀》补文来看，朱谋玮跋语也很可疑。

反过来，如果朱谋玮跋语属实，那可以得知，他只是从许子洽处转钞钱功甫《隐秀》补文再写寄梅子庾刊行，他没有见过“故家旧本”，也就可以逆推，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儿子没有见过“故家旧本”，也就可以推论，徐爌跋语所言朱孝穆（朱统镠）得“故家旧本”为假。

由于目前没有存世的宋本《文心雕龙》，不能确定《隐秀》篇的原初面貌，也就无法直接证实《隐秀》补文的真伪，以上朱、徐跋语也就难以证

^①此事颇为蹊跷，许子洽于1615年钞全《隐秀》，朱谋玮钞补并写寄梅子庾刊刻也应在此年或稍后，但梅子庾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六次校定重修才首次刊出全文《隐秀》，时间已过去了七年。

^②徐爌最早的跋作于万历辛丑（1601年）三月望日，最晚的跋作于崇祯己卯（1639年）中秋，可见徐爌研究《文心雕龙》的时间跨度至少有38年。

实。但我们不妨做出如下假定：大概明人只伪作了一篇《隐秀》补文（究竟谁人伪撰姑且不论，补文版本的细微差异也暂且忽略），却想着给它安排不同的来源，比如，钱功甫说补文钞自阮华山所藏宋本；朱谋玮说补文转钞许子洽并写寄梅子庾，所据乃钱功甫宋刻本；徐燊说补文乃从朱孝穆处钞录，所据乃朱孝穆所得之“故家旧本”；冯舒从钱谦益处借得钱功甫《文心雕龙》校本，请谢恒钞录，其《隐秀》补文则“恐遂多传于世，聊自录之”^{[6]751}。这四条线索中，主要涉及两个源头，即阮华山本与朱孝穆“故家旧本”。这就导致诸跋之间的矛盾冲突，就连朱谋玮与朱孝穆父子之间的说辞都不能严丝合缝、自圆其说，反而显得彼此矛盾、无法两全。类似同一补文却有不同源头的情况，在清初有关《文心雕龙·隐秀》跋语中还在继续，比如何焯说《隐秀》补文得自其弟所得“贾人旧本”，吴騫说录补《隐秀》四百余言所据是“胡夏客所藏宋本”^[18]。

六、关于《隐秀》真伪问题的说明

截至目前，学界对于《隐秀》补文的真伪问题仍争讼纷纭，莫衷一是。清代纪昀首先质疑补文为伪作，其后黄侃、范文澜、杨明照、王利器、祖保泉等皆认其为伪，但詹鍈、周汝昌等人认其为真。双方就版本来源、版印字数、语词运用、语言风格、对于陶渊明的评论、宋代张戒《隐秀》篇引语不见于补文等多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笔者无意就双方争论焦点细作分辨，但通过考证徐燊跋语“王孙孝穆”的身份、梳理徐燊与朱谋玮、朱统镠父子的交往，比照分析徐燊跋语与朱谋玮跋语的内在矛盾，推测《隐秀》补文应为伪作。

由于尚未发现真正的宋本《文心雕龙》，无法找到证明《隐秀》补文属于伪作的直接证据，而从版本来源、版页字数、语言运用、避讳、对陶渊明诗歌的评论以及是否保存张戒引语等方面来论证真伪，都只是间接证据。如果多个间接证据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其可信度就会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只有一处文献证明“王孙孝穆”不是朱谋玮，也不是朱谋垕，而是朱谋玮的儿子朱统镠，但从他们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即可推断朱谋玮跋语与徐燊跋语之间彼此矛盾，从而为《隐秀》补文

证伪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这也是一个证伪的旁证。当然，要完全确定《隐秀》明代补文的真伪，除了有待于宋本《文心雕龙》的出土，还需要更多的旁证。

【参考文献】

- [1] 朱彝尊. 明诗综: 第70卷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460册.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06.
- [2]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634.
- [4] 徐景熹. 福州府志 [M]. 台北: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7: 1164.
- [5] 汪春泓. 曹学佺评《文心雕龙》述要 [J]. 许昌师专学报, 2000 (3): 62-67.
- [6] 杨明照.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7] 刘坤一. 光绪江西通志: 第4册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636.
- [8]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 [M]. 瞿凤起, 潘景郑,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46.
- [9] 王利器. 文心雕龙校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84.
- [10] 詹鍈. 再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 [J]. 河北大学学报, 1982 (1): 55-58.
- [11] 祖保泉. 文心雕龙解说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 [12] 刘跃进.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魏晋南北朝卷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431.
- [13]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39.
- [14] 陶宗仪. 书史会要: 朱谋垕·续书史会要 [M].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367-368.
- [15] 胡继谦. 隐之先生懿行纪略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20册.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39.
- [16] 林仲湘. 疑年录补六十例 [J]. 广西大学学报, 1980 (2): 105-116.
- [17] 詹鍈. 文心雕龙义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522.
- [18] 朱供罗, 李笑频. 《文心雕龙·隐秀》明代补文之来龙去脉及影响——兼论《文心雕龙》有关版本 [J]. 昆明学院学报, 2017 (5): 87-93.